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20 年第 7 期 · 总第 751 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内容

意大利反德声潮再起

手机数据中的抗疫行动

疫情之下的防护：内衣厂转型生产口罩

我所在的地区有多少重症监护床位？

被阻拦的波兰护工

德国近期大事记（3月25日~4月10日）

意大利反德声潮再起

《时代周报》4月1日 意大利在本次新冠危机中惨遭重创。当地反德势力利用民众的不满，将反德情绪扩散到极右翼团体外的其他群体。

意大利极右翼政党兄弟党(Fratelli d'Italia)主席焦尔嘉·梅洛尼(Giorgia Meloni)不久前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上发布了一段 23 分钟的视频。梅洛尼在这个视频中称，德国有意将意大利推向灭亡，以接管所有具有价值的意大利企业。在她看来，欧洲只是帮助德国实现独统欧陆计划的工具。这种恶意揣测并不新鲜。意大利极右翼政党长期以来一直持有这种观点。意大利前内政部长、联盟党(Lega)主席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也是该观点的支持者。

事实上，在举国忙于抗击疫情的背景下，这种阴谋论几近绝耳。其次，当前的执政联盟总的来说属于“亲欧派”。但有关摧毁意大利的阴谋论却在上周二卷土重来。

欧元区各国财政部长上周二召开了一次视频会议，探讨如何应对新冠危机。会议过程中，有关发行“新冠债券”的想法应运而生。该债券属于欧洲共同债券，且有一定的时限，旨在减少新冠危机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作为这次疫情中受灾严重的国家，意大利最先提出这个想法。紧接着，西班牙和法国纷纷表示支持。可惜并非所有财政部长都赞同这个提议。它重新激起了各国长达十年的争执：人们是否应该通过共同债券或危机基金援助陷入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后者显然可以提供更多的监管空间。这也正是荷兰和德国支持它的原因。

“别用老旧的观点看世界！”

据称，荷兰的财政部长曾质疑为何要对经济良好时期依然表现不佳的国家进行援助。这在当时死亡人数就已破万的意大利引起了极大愤怒。而在两天后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视频会议上，各国仍未达成一致意见。荷兰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在会上坚决反对发放“新冠债券”。德国也反对如此，因其担心这会造成债务的共同化。此外，据说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Giuseppe Conte)曾直言不讳地对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 Merkel)说，“别用老旧的观点看世界！”

自那以后，许多意大利人便对袖手旁观的欧盟与德国感到不满。曾任意大利总理和欧盟委员会主席的社民党人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警告道，“如果欧洲不团结一致，我们将从世界地图上消失！”普罗迪的话表明，对于欧盟的不满情绪已经远不局限于意大利极右翼团体。尽管荷兰是共同债券的最大反对者，其首相吕特却仅被视作

政府的“传声筒”。相反，人们却常常将对欧盟的不满转移至最强大的成员国——德国。联邦德国早在三月初疫情开始时便发布了严禁医疗防护设备出口的法令。这也招致了意大利人民的强烈不满。

卷土重来的“德军”一词

虽然意大利北部的重症患者目前正在德国境内接受治疗，意大利也受到了德国的医疗物资援助，但这些事情取得的关注远远不及俄罗斯、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援意团队。

“丑陋的德国人”这种陈词滥调依然流行。备受用户喜爱的意大利门户网站 Dagospia 与其他相关媒体也重新开始使用带有贬义的“德军”(Crucchi)一词。罗马的一位外交观察员担忧道，意大利人对于德国人的厌恶正逐渐扩散到社会主流与政治领域。

“默克尔，隔离到生命的尽头吧！”

德国驻意大利大使也在信函和社交媒体中感受到了这种反德情绪。诸如“滚出欧盟”和“默克尔，隔离到生命的尽头吧”这类口号已经是其 Facebook 主页上收到的较为温和的留言了。他们表示，亲自回复留言并主持用户讨论也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德国大使维克多·埃尔布林(Viktor Eibl)算是半个意大利人。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还与当地人民关系良好。为了保持双边对话，他每周都会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在他看来，这对于这一时期而言“尤为重要”。

除他之外，意大利前总理、现任“意大利活力”党主席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也在积极推动双边对话与补偿。他在电话采访中表示，有些争论是合理的，人们不能因此而失去理智。许多政客简单地将过错归咎于德国人，但这种做法并不负责。“不管怎么说，我们和他们坐在一条船上：一旦德国经济重新焕发活力，我们的经济也将复苏。因为德意两国始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截至目前，欧盟为向意大利放宽《稳定公约》做出了大量努力。“我始终支持关于发放欧洲债券的提议，但前提是它不能有损我们的国家稳定。”

被击溃的人民

意大利将于本周度过疫情高峰。在疫情爆发的六周时间里，该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约为 12000 人。此外，全面封城、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也使人民濒临崩溃。意大利总理孔特在上周的欧盟峰会上重启有关发行“新冠债券”的讨论。他在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2020 年第 15 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现在正是欧盟证明自己的时刻”。意大利在初期的经济支持计划、经济刺激方案和国民救济金中共支出了 500 多亿欧元的财政资金，国家财政部早已不堪重负。不仅原先富裕的北部地区可能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其南部

地区也将在封城之后出现大规模的贫困。

在北部地区的人们为经济发展停滞忧愁之际，南部地区的人们正陷于社会动荡而引发的巨大恐慌。非法劳动者按规定无法申请这一时期的国家救助。上周末，意大利政府向西西里岛的各大超市派遣了警察与军队，以防出现哄抢事件。内政部担忧着社会动荡的产生。西西里自治区首府巴勒莫市市长莱奥卢卡·奥兰多(Leoluca Orlando)日前要求国家向公民发放“穷困金”，以杜绝社会动荡或黑手党出现的可能。正因国家急于用钱，政府领导才会如此不安。意大利总统塞尔吉奥·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曾在一次讲话中质疑欧盟与德国是否清楚这场博弈的代价。

别让意大利成为下一个希腊

意大利左翼自由派哲学家马西莫·卡奇亚里(Massimo Cacciari)在一次通话中表示，许多政客都在借机煽动民意。意大利正陷于“意想不到的贫困”。但即便如此，当地的反德与反欧势力仍然较为薄弱。卡奇亚里认为，眼下并无政权更迭的可能。政府在民调中表现良好。相反，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兄弟党的得票率却出现了下滑。要想维持这一势头，欧盟必须在财政问题上团结一致。他戏称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和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为“三大缪斯”，并抨击她们为民粹主义与反动势力铺平道路。

但他同时也承认，意大利曾犯下许多错误并错失改革良机。因此，人们必须把改革同欧债一类的援助措施相结合。他还认为，“德国要在欧洲发挥领导作用。但各国必须团结一致并明确各自的责任。人们在欧元危机时对希腊犯下的错误不能再犯”。

手机数据中的抗疫行动：“待在家里！待在我们的监视下！”

《法兰克福汇报》3月18日 新冠危机背景下，欧洲各国正通过手机数据确认公民是否遵守禁令。但它们有权利这么做吗？

只有德国还未实施出行限制。默克尔的“避免社交”要求至今仍未付诸行动。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的例子却也说明，这只是时间问题。那么各国要如何确认公民是否遵守这一规定呢？单凭警察可能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各国正在讨论除了限制出行之外还能利用哪些技术阻断疫情传播。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长洛塔尔·维勒(Lothar Wieler)在三月初提出，利用手机数据是追踪新冠病人接触史的一个“好办法”。但他同时也指出，目前人们对于这

些数据的使用是否违背伦理或者法律还没有明确的说法。德国电信周三发布的一则消息引发了巨大轰动。公司发言人表示，为了抗击新冠疫情，该公司免费向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提供了所有用户的数据。而此前从未发生过如此大范围的信息共享。

无法实现用户追踪

此次提供的数据包括匿名的地理位置信息。人们可以通过它还原用户的移动轨迹。但为了不泄露用户姓名，电信公司至少对 30 条数据进行了概括。因此，人们不能获取用户姓名，也无法实现所谓的用户追踪。但不管怎么说，电信公司提供用户数据是事实。此外，这些数据也常被私下出售。这位发言人还表示，移交工作在联邦数据专员的监督下进行，整个过程完全符合《联邦数据保护法》要求。

联邦数据专员乌尔里希·凯尔伯(Ulrich Kelber)认为移交过程十分安全。周三发布的这则消息中指出，特别是在当前的疫情下，没有人会拒绝旨在防控的数据移交要求。即使无法通过这些数据获取用户信息，研究人员仍对目前取得的成果表示肯定。洛塔尔·维勒在周三表示，“这些数据能够说明公民的整体流动性降低与否。一旦他们不遵守禁令，我们就能从数据上发现这一点”。

数据使用必须得当

比起匿名的地理位置信息，个人数据当然更加敏感，尤其是健康数据。乌尔里希·凯尔伯在上周五表示，所有提取或处理这些数据的人都必须具备相应的责任意识。只要他们合理使用这些数据，就不会遭遇疫情下的数据保卫战。“因为公民健康是目前的焦点。”他还表示，为了开发有助于抗击疫情的应用程序，联邦数据保护部门仍与研究所保有联系。此外，在他看来，尽管其他国家并不重视数据保护，德国却必须重视这一点。所有抗疫措施都必须符合《基本法》要求。此前，中国、韩国、以色列都因利用手机定位有针对性地监视患者而闻名。

部分国有化的奥地利电信公司也向政府提供了可读取用户匿名移动轨迹的手机数据。政府可以通过这些数据评价防控成果，限制公共场所人流量与社会交往活动。该公司表示，这是它们的自发行为，并非应政府要求。数据显示，奥地利人民早在上周末便已大幅缩小活动范围。

非常时期，非常举措

反对党此前一直和执政党站在抗疫同一战线，但它现在却将矛头对准了后者。社民党认为，当前的防疫措施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极大干涉”。与此同时，自由民主党也警告政府要重视公民权和自由权。最后连自由派新党也宣布要启动议会质询。社民党表

示，“或许非常时期需要采取非常举措。但这些措施必须符合国家法治要求”。

政府发言人表示，他们并没有获得个人移动数据。他们仅收到了过去两个周六的整体活动量对比。这不但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还符合数据保护基本条例。电信公司 A1 强调，他们并没有使用用户的个人数据。系统会自动为每个用户生成一个随机的跟踪代码。这些号码每 24 小时都会重新生成一次（依然保持匿名）。人们因此无法通过匿名代码对用户进行长期追踪。此外，所有数据都以“20 人”为一组呈现。这也就是说，人们只能读取 20 或 40 个用户（以 20 为单位的等差数列）的整体移动情况。所以，数据不可能透露大约三个人“从 A 点移动到 B 点”这类的信息。

“完全符合《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要求并通过德国技术监督协会检测”

据称，该试验“完全符合《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要求并通过德国技术监督协会检测”。事实上这项技术常用于商业目的，例如为了查明某地人们的旅游目的地偏好。欧洲很多公司都提供并使用这项技术。

意大利也想利用手机数据中的信息。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的高级卫生官员朱利奥·加莱拉(Giulio Gallera)周二晚在米兰表示，“仍有 40%的公民在频繁移动，这个数据太可怕了”。但他承诺，政府将即刻采取行动降低这个数字。但人们必须“待在家里，待在政府的监视下”。

照搬盟国的监视方式？

米兰市政府通过当地运营商了解到，大约有 60%的居民严格遵守伦巴第大区 3 月 8 日出台的外出禁令。准确地说，大约有 60%的手机用户并未外出或仅在离家 300 米的范围内活动。

相反，该区还有 40%的居民或手机用户离开住宅在全区范围内活动，甚至前往其他地区。朱利奥·加莱拉保证，这些数据都“以完全匿名的方式”被提取和利用。此外，他们“绝对没有效仿盟国监视居民。”在意大利，政府部门有权监视公民的手机或直接监听他们的电话内容。但相关法律的制定初衷主要在于打击有组织犯罪。

而在全国封锁一周后，米兰市政府和中央政府显然已经通过手机数据认识到，他们必须更加严格地实施封禁。内政部为此公布了一份全新的表格。居民在申请外出权限时必须提交这份表格。按照规定，被要求隔离的或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者不符合申请条件。谎报者或将面临最高 12 年的监禁。

内政部表示，国家警察与宪兵队在 3 月 11 日至 16 日期间共监视了近 84 万人。其中有 3.5 万人因违反出行禁令遭到指控。

疫情之下的防护：内衣厂转型生产口罩

《南德意志报》3月26日 德国卫生部长延斯·施潘（Jens Spahn，基民盟）在出席周四的一场新闻发布会时表示，他近日来一直在研究德国国内的各项疫情数据。人们在谈论数据之前，必须对它有清楚的认识。其中包括联邦政府几周前向国内各个诊所、医院、疗养院承诺供应的防护口罩数量。

根据本周初的媒体报道，德国此前订购的600万只防护口罩在肯尼亚的一座机场不翼而飞。尽管国防部发言人称其还未支付这笔订单。但这一突发事件却足以表明：在这场全球卫生危机中，购买充足的防护装备难度之大。施潘指出，“市场竞争空前激烈”。

他的发言人在前一天表示，他们在周二、周三两天内各分发了100万只口罩。然而具体的分配情况只有各州知晓，因为最终的分配由它们负责。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医生工会在周三的联合呼吁中警告道，巴符州各诊所正面临防护口罩缺口。此外，人们还需警惕“医护人员在救治、看护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时感染及进一步传播病毒”的风险。

3D打印机的妙用

巴符州卫生部长曼内·卢查(Manne Lucha)在周二宣称，该州疫情防控工作已“全面覆盖”。据他所言，本周将新增7.5万只FFP2口罩和35万只医用外科口罩。此外，中国也将提供1000万只口罩。但德国联邦医生协会主席安德里亚斯·加森(Andreas Gassen)却认为，防护物资缺口依然存在。一些诊所也将因此关门。

在防护设备与医疗器械紧缺的同时，人们对许多商品的需求中断。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那些目前停产或生产非急缺物资的工厂能否转而生产防护口罩与呼吸机？

联邦与州首先将目光投向了汽车工业。虽然这些工厂都已停工，但是它们的生产力巨大。除此之外，汽车制造厂拥有的3D打印机可以生产任意类型的配件。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各大厂商一致认为，还要研究这一方案的可行性。

复杂医疗设备的转型难度

吕贝克的医疗器械公司德尔格(Dräger)除防护设备之外，还生产享誉世界的呼吸机。在它看来，将生产线转移到那些从未接触过呼吸机生产技术的企业存在“众多问题”。一方面，该领域的核心技术与汽车工业有着本质区别。另一方面，二者所要求的生产条件也不同。

换句话说，人们不能就这样不加思索地让前不久还在制造车门的企业转而生产用于拯救生命的高精医疗器械。

工业巨头的转型

工业集团正在寻求其他途径发挥自己的作用。保时捷公司表示，愿意将项目经理和 IT 人员借调到需要的领域。西门子公司也向需要配件的医生和诊所开放了 3D 打印机平台。尽管他们难以为复杂器械的生产提供支持，但在简单的医用物资领域，这类合作取得了非凡成果。

当前大量的防护口罩由其他领域的工厂生产，例如巴符州的工业椅生产商 **Mey**、以生产内衣和运动衫闻名的服装制造商 **Trigema** 和维尔茨堡的床垫生产商 **Wegerich**。

曼海姆的原乙醇生产商 **Crop Energies** 正在生产可用于消毒的中性酒精，与它相似的还有酒类制造商 **Jäger** 和 **Berentzen**。

最后还有以消费品生产商和汽车业供应商闻名的德国工业巨头——博世公司 (**Bosch**)。该公司的医疗技术部门与英国朗道实验室 (**Randox Laboratories**) 已共同研发出可用于检测新冠病毒的全自动快速检测仪。该仪器将于四月正式投入使用。据说，它可以在 2.5 个小时内同时对 10 种呼吸道病原体进行检测。但仍有许多公司致力于研发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博世公司正试图在这一领域开辟一席之地。

我所在的地区有多少重症监护床位？

《时代周报》4月1日 德国日前建立的重症床位实时数据库 (DIVI 数据库) 有助于人们了解国内重症监护病床的使用情况。它不仅对抗击疫情至关重要，还将带领人们取得胜利。

目前看来，德国似乎能同意大利一样从这场新冠疫情中脱身。这个数据库在提供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人数的同时，也记录了所有重症监护病床的使用及空余情况。

数日之前，没有人确切知道德国医院的重症监护病床数。政客们反复提及的“28000”也只是两年前的数据。再者，这一数字并非所有当时可以使用的床位数，其中还包括一些预设床位。但要想有效地抗击疫情，最重要的莫过于掌握已经得到救治的重症患者数量，尤其是在疫情恶化之时能继续得到收治的重症患者数量。

一个由德国重症和急诊医学跨学科协会 (DIVI)、罗伯特·科赫研究所 (RKI) 和德国医院协会 (DKG) 组成的团队试图改变这一点。大约两周前，这三个机构共同启动

了一个覆盖全德范围的重症监护病床数据平台。截至目前，已有绝大多数的德国医院上报其重症监护病床的使用及空余情况。

平台最初的数据显示，由于许多医院的扩建，德国在疫情应对上仍有余裕。截至4月1日6时，约有900个重症监护室上报数据，使用中的重症监护床位数为10340张。而这其中只有18%的床位用于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此外，德国当前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共计1853人。

抗击新冠的重要工具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空余床位都可供新冠肺炎患者使用。因为各医院仍在继续收治其他疾病的重症患者，如心梗患者和重大事故伤者。平台建立者对此仍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目前看来，德国的重症患者收治能力足以满足疫情高峰时期的床位需求。

不可思议的是，尽管数据平台对危机规划意义非凡，但它此前却从未出现过。这和德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在德国，医院属于各州事务，各州所需的病床数也由其自行规划。那么最起码这16个联邦州的卫生部门需要清楚各自的重症监护室与病床数量。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一个联邦州对重症监护室的负载情况进行过实时登记。

无论是停学还是限制出口，所有的疫情防控举措都旨在减轻公共卫生体系的负担。重症患者的增长速度越慢越平稳，患者接收良好看护与救治的机会越大。传染病学专家莱纳斯·格拉贝海里希(Linus Grabenhenrich)认为，这场疫情暴露出的德国公共卫生体系缺陷便在于重症监护。他曾参与监管数据库在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创建工作。“这是核心问题”，格拉贝海里希如是道。人们必须时刻掌握接受重症治疗的患者人数以及各医院剩余的重症收治能力。

克里斯蒂安·卡拉吉安尼迪斯(Christian Karagiannis)是科隆-曼海姆肺炎医院的首席主任医生，也相当于这个平台的医学主任。在他看来，对重症监护床位的精准认知是除疫苗之外抗击疫情的最佳工具。

目前约有80%的医院可以随时收治患者

卡拉吉安尼迪斯在建立平台的过程中也曾遇到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比方说，尽管存在最低标准，但人们对于重症监护病床至今还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此外，也没有人清楚重症监护病房的具体功能。卡拉吉安尼迪斯认为，数据平台能够改变这一切。通过这个平台，人们可以清楚掌握剩余的重症监护收治能力。

为此，科学家和医生已经确立了新冠肺炎治疗的三个重要阶段：初级看护(low care)、高级看护(high care)与体外膜肺氧合(ECMO)。初级护理主要指以氧气面罩辅助患者进

行常规呼吸。高级护理指以气管插管的方式，即借助呼吸机在患者肺部形成气压，替代患者进行呼吸，并让其处于人工昏迷状态。最后，体外膜肺氧合作为最为昂贵的治疗方式，主要用于救治肺损伤严重的患者。患者的血液将在体外的一个机器中进行气体交换，人们也因此称其为人工肺。

人们可以通过平台随时了解任意等级的床位使用及空余情况。这不仅有助于卫生部门，还利于政策的制定。医院和紧急服务中心可以随时查询所在地区的空余床位数，以便送治患者。传染病学专家格拉贝海里希称，“这个数据库是一个中央控制系统”。而在另一个类别中，平台还列出了疫情恶化时可以快速空出的床位数。格拉贝海里希表示，“仅凭已使用的床位及空余床位的数量无法帮助我们解决 50 名突发患者的救治问题”。因此，医院还要基于患者的健康状况，计算出可以安排转院或者出院的病人数量，最终得出 24 小时之内可以空出的病床数。他还指出，人们不能从现有的统计系统中直接获得这个数据。医院需要每天对此进行重新计算。

重症患者人数未呈指数增长

这个数据的重要性尤其可以体现在重症患者人数骤增的情况下。4 月 1 日的实时数据显示，各医院在未来 24 小时内可以空出的重症监护床位数约为 8300 张。

毫无疑问，这个数据库将为各医院带来额外的工作量。毕竟光是卫生部门的数据收集就已消耗了后者大量的精力。然而，仍有许多医院加入数据库。肺炎专家卡拉吉安尼迪斯称，“德国目前带有重症监护病房的医院约为 1200 所。截至 4 月 1 日，已有 912 所医院加入我们的数据库”。他还指出，总体来说，各医院都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它们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强烈的意愿。”

但要注意的是，数据库尚未完成。再者，并不是所有医院都会每天更新它们的床位信息。平台运营者希望政府能够出台政策，让快速申报成为医院应尽的义务。德国重症监护和急诊医学跨学科协会主席乌韦·詹森斯(Uwe Janssens)上周四在介绍这个数据库时说道，“我们恳请包括卫生部长施潘在内的社会各界让所有医院都参与进来，这一点尤为重要”。

虽然平台现有的数据已经为人们了解疫情助力良多。政客、专家和许多民众也在每日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呈指数增长的新增感染人数。但这并不是评价德国新冠疫情现状和未来走向的决定性指标。因为感染人数的新增趋势主要与几周来持续增加的检测量有关。

尽管如此，统计无法自主呼吸的重症患者人数对评估公共卫生体系负荷极其重要。只要呼吸机的数量足够多，绝大多数的重症患者就能得到救治。只有在床位稀缺的情况下，德国才会面临同意大利一样的困境。

数据显示，德国的重症监护室仍有余裕。格拉贝海里希称，德国能够轻松应对当前的疫情。新增重症患者人数早已不像新增感染人数一样庞大。而且即便如此，各医院也有大量配备完善的重症监护病床可供使用。

康复医院的床位数也是重点

此外，这个数据库还带有一个红绿灯系统。各医院每天除了上报重症监护病床的使用及空余床位之外，还要以红、黄、绿三种颜色对本院的重症病患收治能力进行评价。在患者人数最多的高级护理领域，目前只有 6% 的医院亮红灯。这表示这些医院不再具备重症病患收治能力。它们因此也无法继续接收重症患者。近日来，这一数据并无明显变化。在 3 月 19 日，即平台开放之初，该数据也仅为 5%。还有近 80% 的医院将其重症病患收治能力登记为绿色。这些医院可以随时收治新患者。

有关床位数据库的设想并不仅限于此。虽然有些患者在急性病发时可以进行自主呼吸，但他们在之后的康复过程中仍有可能因肺损伤而需要借助呼吸机。因此，运营者还需建立一个平行系统，以实时记录康复医院配备呼吸机的床位数。格拉贝海里希强调，“患者能否康复的关键不仅在于救治医院的重症患者收治能力，还在于康复医院的收治能力”。

被阻拦的波兰护工

《时代周报》3 月 30 日 乔安娜·科尔茨（Joanna Korcz）几天前便已收拾好自己的行李，里面装有衣服、化妆品、一些书以及孩子们的照片。48 岁的她原定前往德国看护一名现已 86 岁高龄的女性老年痴呆症患者，并在后者位于乌尔姆附近的家中待上六周。为了能够 24 小时看护她，科尔茨还需要暂住在这位女士家里。按照计划，她的工作应该从明天开始。

但是昨天的一通电话中止了她的计划。电话那头是交通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这名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告诉她，所有前往乌尔姆的公交都已停运，并且没有任何备选方案。科尔茨表示，这名工作人员给出的理由仅仅是“因为疫情”。此外，开往德国的小型客车的票价上涨了一倍。这使她打消了乘坐小型客车的念头。她陷入了茫然，并自问自答

道，“我现在还能做什么？除了待在家里，什么也不能做”。她指的是自己在莱扎伊斯克县的一个单间住房。这个居民数仅为3万的小城位于意大利北部波美拉尼亚地区。

而在据此西南方向一千公里之外的法兰克福，专员乌特·埃尔米施正感觉自己被国家所抛弃。她84岁高龄的父亲在一次严重中风后只能终日坐在轮椅上。他的右半边身体已经瘫痪，活动能力有限并且无法说话。此前他一直由波兰护工轮流看护。目前的护工将于4月2日合同到期后返回波兰，而她也早已安排好这之后的临时看护，因为第一个护工直到5月1日才会返回工作。但她现在却担心这位护工无法通过德国边境。她抱怨道，“疫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但我需要一个确定的规划”。

“一旦情况得不到改善，我们将面临严峻的问题”

德国约有30万人依赖于外籍护工。后者可以为他们擦洗身体、洗衣做饭和采购物资。这些护工大多数来自东欧国家，尤其是波兰。但不受法律保障的身份、边境封锁措施和疫情带来的担忧让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来德务工。

德国家庭护理协会(VHBP)估计，如果这些情况得不到改善，复活节前将有20万户家庭缺少护工。这对于需要看护的人们和他们的家人意味着什么？对于护工和中介机构意味着什么？对于整个社会的护理体系又意味着什么？毕竟正是这些护工支撑着全社会的护理体系。

朱利安·波尔是德国“家庭天使”看护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该公司为大约4千名独立护工介绍客户。这些护工大多来自东欧国家。科尔茨也是这家公司的员工，而埃尔米施正是他们的客户。

护工群体“大到不能倒”！

波尔表示，“我们的客户仍能得到很好的看护。但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我们将面临严峻的问题。”自新冠危机开始，大约有30%的护工未能按照计划来德。该公司目前主要通过延长在岗护工的劳动合同或利用其他在德护工来抵消这部分的劳动力缺口。“我们还能坚持四周左右”，波尔补充道，“四周之后我们也将陷入困境”。

事实上，护工群体未能返工的原因有很多。波尔指出，很多人担心在德国感染新冠病毒，比方说在返工的路上、在客户家里或在外出采购时。她还表示，这些担忧并非毫无根据，因为护工群体缺乏防护服。

警局开具的往返证明

此外，有些人担心：一旦进入德国，他们之后将无法返回或难以返回自己的国家。因为当前所有从德国返回波兰的人们都必须接受为期两周的隔离。“对于很多人而言，

这个代价太大。”

第三，旅行限制。立陶宛目前不再允许在德没有固定居留地的护工前往德国。而在波兰，持联邦警察总局开具的往返证明的公民仍能进入德国。但没人知道这种状况还能维持多久。

第四点便是科尔茨碰到的交通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频率很高。波尔解释道，“许多波兰交通公司都已停止服务。原因是公交司机在往返德国之后也要接受为期两周的隔离。”因此，有些交通公司便先把乘客送至边境附近，再让他们下车自行越过边境。“我们的工作人员将在这边迎接他们”，她补充道。

医院早已不堪重负

波尔要求国家将护工群体也列为“大到不能倒”。政府不仅需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疫物资，还要为他们解决跨境交通问题。这个提议得到了支持。

德国家庭护理协会会长弗雷德里克·西博姆强调，“我们不能让他们以乘坐公共汽车或小型客车的方式到达德国”。只要车上有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其他乘客就承担着被感染的风险。“更何况这些护工来德之后接触的恰巧又是高度易感人群。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些需要 24 小时护理的人们通常都身患重病。他们或无法活动，或活动受限，又或身患老年痴呆症等其他疾病，因此根本不具备任何生活自理能力。

最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外籍护工不再来德，等待着他们的会是什么？

西博姆指出，所有护理门诊都已到达极限并且人满为患。甚至就连医院目前也不具备收治这些人的能力。

他希望这些人的亲友能在此事上贡献更多的力量，即使可能并非完全出自自愿。他强调，“家人们暂时需要花费更多的心力”。他提议子女可以搬回需要看护的父母家中。或者，人们还可开展“邻里互助”行动。

非法用工问题

一旦计划失败，埃尔米施将只能亲自上阵照看她的父亲。她现在每周都会驱车前往距她 190 公里的卡塞尔探望她的父亲。她还表示，在波兰护工无法返回德国的情况下，她将搬到父亲的家中居住。“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埃尔米施感到无奈。眼下她只希望这不会对她的工作造成影响。

西博姆要求国家给予这些家属更多的支持，例如对他们在这段时期减少的工作量进行一些经济补偿。事实上，国家早已为有父母需要看护的子女制定了此类法规。

季节性工人禁止入境

而在看护老人方面，仍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西博姆认为，这与市场的性质有关。德国足有 90%的护理人员属于非法用工。此外，他还谈到了多年中形成的非正规组织、个人劳工以及非法用工的影子公司。这些公司的职员既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事故险。他在最后指出，国家长期忽视这些问题。

即使人们现在解决这些问题，也有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并造成严重后果。

德国内政部上周三收紧了入境规定。据此，季节性工人将无法进入德国，看护领域的工作者除外。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出示劳动合同。这是要过滤掉护工中的非法劳动者吗？

西博姆对此的观点是，“作为协会主席，我自然认同政府对市场进行监管。但这无疑会使德国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

波尔认为，护工市场的非法用工目前仅是次要问题。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要为所有看护公司和护工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只有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后，人们才能对打击非法用工和市场监管进行考虑。

科尔茨希望公交能在两周后重新恢复运行，并将她送至位于乌尔姆附近的客户家里。失去这份工作将使她面临经济问题。“因为我还需要支付房租”，科尔茨解释道。但她的儿子也会给予她一定程度的经济支持。她的儿子是一名卡车司机。因此，他现在还能顺利往返于波兰和德国之间。但在边境规定日益严格的背景下，没人知道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久。

德国近期大事记（3月25日~4月10日）

3月26日 德国联邦卫生部长延斯·施潘在新冠肺炎疫情记者会上表示，德国必须延缓病毒传播速度，增加重症监护收治能力。德国是世界上新冠病毒检测最为充分的国家之一，目前每周新冠病毒检测量可达 50 万次。

3月28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居家隔离期间发表音频讲话，表示目前不会放松疫情防控措施。默克尔在讲话中说，每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让人无法松懈和放松疫情防控。目前无人能确定艰难时刻会持续多久，她呼吁德国民众保持耐心。

3月31日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天零时，

德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 61913 例，较前一日新增 4615 例，累计死亡病例 583 例。

4 月 1 日 为了应对新冠病毒疫情，欧盟委员会计划为意大利、西班牙及其他“重灾区”国家追加高达 1000 亿欧元的援助资金，用于短时工补助。欧盟各国必须根据其自身经济水平共同负担，德国所应承担份额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4 月 2 日 为了确保紧急医疗物资的及时供应，德国总理默克尔直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联系，德国联邦政府向中国大型医疗物资生产商集中采购。中德两国之间架设“空中桥梁”，德国汉莎航空每日将派出一架载重 25 吨的客机，作为医疗物资运输专机，飞往上海接货，以保证在中国订购的口罩等医疗物资能够顺利运回德国。由联邦政府集中采购的防护物资将有 85% 供给各级医疗部门使用，其余的 15% 供给联邦政府机构及各级行政部门，其中包括地方警察局和技术援助机构。医生联合会会把口罩发放给诊所，各联邦州负责向医院、养老院等发放医疗防护用品。

4 月 9 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第三次出镜，就新冠肺炎疫情发表讲话。这也是她结束医学隔离后第一次面对全国民众。在讲话中她强调，在复活节假日期间，仍要遵守“新冠肺炎防疫紧急措施”，只有遵守规则，德国之后才能进入正常生活状态。现在新冠肺炎的感染数据给大家些许希望，但是这个时候更不能掉以轻心。

4 月 10 日 德国联邦内政部发布临时性法规称，申根签证到期后受疫情影响暂时无法离德的人士，无需承担违法滞留责任，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之前无需办理居留许可手续。在此日之前，所持申根签证过期者仍被允许务工。德国联邦内政部将根据疫情发展态势评估是否延长此项临时性措施。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 10 日、25 日出版
2020 年 4 月 10 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陈孜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